

忠實之外：日譯《古都》的章節重構

廖詩文

本研究探討朱天心《古都》日譯本中章節重構的翻譯現象。原著的章節安排是由〈威尼斯之死〉至〈古都〉推進，全程充滿情感張力，並以展望未來的開放書寫收尾做結。日譯本的章節安排卻逆向而行，將〈古都〉置於開篇、〈威尼斯之死〉移至結尾，改變敘事起點與情感節奏，此譯案促使我們再思譯者是否可以改變原文章節及譯者主體性相關的譯學問題。本研究採用文本對照、多重理論應用與比較案例的研究方法進行探討。理論方面以操縱理論、目的理論、歸化／異化策略及結構性顯化概念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清水賢一郎作為文化中介者，有意透過章節重構強化主題並契合日本讀者的閱讀習慣。其次，日譯本將原作的開放性轉化為「苦痛記憶」，而在翻譯策略上，譯本的宏觀結構採用歸化策略，文化細節則以「漢字加假名」與「夾注」等翻譯技法保留了異化特徵。相較其他譯案，本研究進一步將此重構策略定位為一種溫和且高效的「跨國出版策略」。與村上春樹《發條鳥年代記》英譯本的大幅刪減或《道德經》因思想邏輯重組而改章皆有不同，《古都》日譯本在完整保留內容的前提下，僅以章節順序的重構便實現了文化適應與情感調整，避免了因內容刪改而引發的忠實爭議。此譯例挑戰了翻譯學中「忠實」與「創造」的二元劃分，並彰顯出譯者主體性可在結構層面發揮創造力。譯者在此譯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是語言轉換者、文本重構者，也是閱讀路徑的設計者，並使翻譯成為其與作者的對話。

關鍵詞：章節重構、譯者主體性、《古都》、操縱、集體記憶

收件：2025 年 8 月 25 日

修改：2025 年 12 月 7 日

接受：2026 年 6 月 3 日

Beyond Fidelity: Chapter Reordering in the Japanese *Old Capital*

Shihwen Liao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chapter reconfiguration i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hu Tien-Hsin's *Old Capital*. The original arranges chapters from "Death in Venice" to "Old Capital," sustaining emotional tension and closing with an ending framed as an open, future-oriented vision. The Japanese version, however, reverses the order, opening with "Old Capital" and concluding with "Death in Venice." This inversion shifts narrative entry and affective rhythm, prompting a reconsideration of whether translators can or are permitted to alter textual structure and how such practice reflect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Employing textual comparison, a multi-theoretical analytical approach, and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the study draws on manipulation theory, Skopos theory in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and structural explication. Findings reveal that Shimizu Kenichiro, as cultural mediator, deliberately restructures chapters to reinforce themes and accommodate Japanese readership. The translation recasts the source's openness as "painful memory." At the macro level, it follows a domestication strategy, while cultural details retain foreignizing features through devices such as "kanji glossed with furigana" and annotations. Unlike the extensive cuts in the English *Wind-Up Bird Chronicle*, which triggered debates over fidelity, or the logical reordering of the *Dao De Jing*, the Japanese *Old Capital* preserves the full content, a mild yet effective transnational publishing strategy, achieving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emotional recalibration solely through sequencing. This case challenges the binary of fidelity versus creativity, highlighting translator agency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Here, the translator acts simultaneously as linguistic mediator, textual reconfigurator, and architect of reading paths, rendering translation a dialogic engagement with the author.

Keywords: chapter reordering,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Old Capital*, manipulation, collective memory

Received: August 25, 2025

Revised: December 7, 2025

Accepted: June 3, 2026

壹、引言

朱天心的長篇小說《古都》自 1996 年出版以來，便被視為臺灣當代文學中探討「身分認同」（self-identity）與「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¹的代表作。該作以其獨特的時空敘事、多重互文（intertextuality）等視角，²在華語文壇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在《古都》中，城市不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情感與記憶的觸發點——京都、威尼斯（Venice）、布拉格（Prague）、臺北等地，被編織成一張情感與文化的地圖。然而，其複雜的敘事結構與深層的文化意涵，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也帶來了獨特的挑戰。

本研究旨在探討 2000 年由清水賢一郎翻譯的《古都》日譯本（朱天心，1997 / 2000）。³該譯本的譯者對原作章節進行了逆序重構（具體變化請見表 1），這種顯著的「操縱」與「重寫」（Lefevere, 1992），如何使譯文適應目標文化的閱讀規範，並達成功能對等的效果（Nida, 1964），正是本文試圖進一步釐清的議題。這一改動不僅改變了敘事的起承轉合，還影響了整部作品的情感節奏與讀者對主題的理解。宏觀層面的結構重構，引發我們思考翻譯本質與譯者角色的相關議題，例如譯者是否可以調整原作的章節順序，就是翻譯學上長期存在的爭議。支持者認為，翻譯是跨文化的再創造，譯者可依據目標讀者的閱讀習慣與文化接受方式調整文本結構；批評者則指出，此舉可能削弱原作的形式特徵與異質性，甚至造成文本意義的偏移（Berman, 1985/2000; Venuti, 1995）。

《古都》日譯本對章節順序的改動是否超越了傳統翻譯的範疇？其背後蘊含了何種功能目的與文化意涵？我們應如何從譯學理論的角度解讀譯者在

¹ 「集體記憶」是指一群人共同擁有並傳承的記憶，由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用以區分個人記憶。它像是一種群體的記憶框架，形塑成員的共同行為與觀念，並透過文化經驗與社會關係影響群體，傳遞共享的知識與價值（哈布瓦赫，1925 / 2024）。

² 多重互文的概念指的是在一個文本中，通過引用、借用或互相參照其他文本來構建意義的方式，不僅限於單一文本的引用，而是涉及多個文本之間的相互關聯與互動。這個詞語源於法國文學理論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用來描述文本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意義建構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Kristeva, 1980）。

³ 清水賢一郎是日本華文文學學者兼翻譯家，除《古都》之外，還譯有魯迅、張愛玲等之作品。

文本篇章結構上的「操縱」？本研究正是在此理論與實務爭議背景下展開，期能探討《古都》日譯本的章節重構策略，分析此一翻譯行動在譯學理論框架下的定位，並與其他跨文化章節重構的翻譯案例進行比較，藉以揭示譯者在「忠實」與「創造」之間的抉擇及其背後的文化邏輯。

由是，主要探討的核心問題包括：第一，清水賢一郎為何選擇將〈古都〉置於開篇、〈威尼斯之死〉置於結尾？第二，這種重構對原作的敘事節奏、情感鋪陳與主題呈現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第三，從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⁴ 目的理論（Skopos theory）、重寫理論、異化／歸化策略（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以及合理化傾向等譯學理論視角來看，這種改動應如何解讀？第四，與其他著名的跨文化翻譯中的章節重構譯例相比，《古都》日譯本的策略有何特殊性？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文本對照分析、理論應用分析與比較案例研究三種方法進行探討：文本對照分析用以呈現原作與譯本之間的結構差異、理論應用分析提供理解這些差異的多重框架，而比較案例研究把《古都》置於更廣泛的國際翻譯實踐脈絡中，梳理各譯例的共通性與獨特性。研究的最終目標，在於釐清《古都》日譯本的章節重構，是如何影響文本的意義建構，以及探討翻譯在跨文化文學傳播中，是如何於結構層面進行文化適應。

貳、原作的多重互文與「你／我」間的主體交織

《古都》以其獨特的多時空敘事和文化記憶書寫受到關注，其敘事視角的特殊性是此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徵。朱天心大量使用第二人稱「你」來召喚記憶，這種敘述方式在華文小說中並不多見，因此容易打破讀者與傳統敘事的距離感，使讀者既成為旁觀者，又被捲入故事情境之中。然而，這種「你

⁴ 功能對等源自奈達（Eugene A. Nida）所提出的動態對等理論。他強調，翻譯不應僅追求文字表面或語言形式的對應，而應在兩種語言之間達成功能上的等效（Nida, 1964）。這意味著譯文應該能夠在目的語文化中產生與原文相似的效果和反應。

／我」的主體切換在翻譯過程中卻帶來挑戰，因為不同語言對人稱代詞的使用頻率與語感差異，可能會影響敘事的親密度與模糊性。

朱天心在《古都》中大量運用第二人稱「你」來進行敘述。這個「你」同時扮演了故事的「敘述者」、「被敘述者」，也暗指了「故事的隱含讀者」（劉雪真，2009，頁 221）。這種敘述方式模糊了傳統上「我」與「你」之間的界線，營造出一種既親密又疏離的閱讀體驗。敘述者「我」與被敘述者「你」在共同的記憶中不斷穿梭，使得時空在今昔之間任意跳躍，形成一種模糊而混沌的虛無感，因此文學評論家便稱《古都》是朱天心的「記憶之書」（朱天心，1997／2000，頁 315；劉雪真，2009，頁 209），亦是作者將個人記憶納入歷史並建立想像邦國的作品（陳國偉，1998，頁 62；劉雪真，2009，頁 209）。而「你／我」主體位相的動搖，便構成《古都》的文學核心，與朱天心身為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記憶與自我認同所感到的挫折彼此呼應（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 173）。

此外，原作也充滿了多層次的互文性，使得文本成為一個交錯複雜的「記憶」網絡。首先，小說標題即與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的同名作品《古都》形成互文關係。朱天心透過川端康成的作品，將臺北與京都對比為「雙胞胎城市」，以此探討集體記憶中「不被記憶的歷史」（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 177）。其次，文本夾雜引用了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夢的解析》（朱天心，1999，頁 183），暗示了小說是對「都市無意識」的解析（唐小兵，2000，頁 394；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 177）；引用梭羅（Henry D. Thoreau）（朱天心，1999，頁 197）與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朱天心，1999，頁 156），則是期待讀者以更複雜的視角理解自然、歷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 177；劉雪真，2009，頁 214）。朱天心透過大量解構／再語境化（de-/re-contextualize）自己早年的作品（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 177—178）如《擊壤歌》，也讓過去的人物與情節在《古都》的語境中穿越時空（劉雪真，2009，頁 206—210），使得故事的意義遠超單一敘事線。

《古都》的中文原作是由五個獨立但又相互關聯的章節所組成。其順序為：〈威尼斯之死〉、〈拉曼查志士〉、〈第凡內早餐〉、〈匈牙利之水〉，最終以標題章節〈古都〉作為收尾（朱天心，1999，頁7—8）。這一順序的編排蘊含一種獨特的情感節奏與邏輯。學者指出，朱天心〈古都〉複製了川端康成《古都》以四季歷時性變化為敘述順序的架構（楊如英，1998；劉雪真，2009，頁211—212）。作品從異國他鄉的旅行見聞開始，先從歐洲的城市如威尼斯、布拉格（隱含於〈匈牙利之水〉）和西班牙（〈拉曼查志士〉）展開，逐步引導讀者進入一種內省式的記憶回溯。故事的情感張力在閱讀過程中逐漸累積，「我」透過對「他鄉」的追憶與反思，最終匯聚於對「故鄉」臺北的歷史與記憶的探索（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175—176）。小說以〈古都〉作為全書情感的最高峰，這種漸進式的記憶積累，讓讀者在歷經多重文化與時空的洗禮後，在結尾處獲得情感的爆發與昇華，並對未來抱持展望。

原作歷時性的章節安排，可以理解為一種堆起情感與記憶累積的敘事策略。原作以外部世界的「他鄉」經驗為起點，逐步內化為對故鄉（臺北）歷史與個人記憶的反思。這種層層遞進的敘事邏輯，恰好呼應了朱天心作為外省第二代所面臨的身分焦慮與文化撕裂感。她對「故鄉」的追尋，是在異地漂流中不斷回望、重組、內省間進行，並在最終回歸到她的故鄉（臺灣）。

參、日譯本章節逆寫的策略性重構

由上可知，《古都》的文學敘事架構是此作品十分重要的書寫策略。然而，歷時性的敘事卻在《古都》日譯本中被逆序重置。誠如前述，《古都》日譯本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便是其章節順序與中文原作的顯著差異。清水賢一郎的譯本並未沿用朱天心原著的編排，而是進行了系統性的重構（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178）。表1呈現兩個版本之間的對照。

表 1

《古都》中文原著與日譯本章節順序對照表

原著章節順序與名稱 (朱天心, 1999)		日譯章節順序與名稱 (朱天心, 1997 / 2000)		結構變化
1	威尼斯之死	5	威尼斯に死す	位置逆轉
2	拉曼查志士	4	ラ・マンチャの騎士	位置微調
3	第凡內早餐	3	ティファニーで朝食を	位置保留
4	匈牙利之水	2	ハンガリー水	提前
5	古都	1	古都	提前至開篇

根據表 1，可以看到日譯本的章節重構是全面且系統化的。最核心的變動，便是將原作末尾的〈古都〉提至開篇；同時將原作開篇的〈威尼斯之死〉移至全書結尾（朱天心，1997 / 2000，頁 5—6）。此番調整，徹底改變了作品的敘事起點與情感節奏：原作從平緩的異國見聞開場，日譯本則跳過漸進式的鋪陳，直接以情感核心的「古都」為始；原作的結尾處獲得情感的爆發與昇華，並對未來抱持展望，日譯本則以一種帶有藝術與衰敗並置的「威尼斯之死」作結。《古都》日譯本對章節的倒行逆置，使日文讀者被推導進悠遠的記憶，使「〈古都〉」（Gu-Du）成為回憶「苦痛／古都」（Kutsū/Kutu）的起點。此種結構安排，是譯者對原作「漸進式記憶積累」敘事策略的「時空逆轉推導」。值得注意的是，《古都》日文版的書封留下清水賢一郎的翻譯伏筆。原作《古都》若以羅馬拼音，應拼寫為“Gu-Du”，然而清水賢一郎卻將《古都》日譯本上的羅馬拼音寫成“Kutu”，將其作了諧音的音變。有趣的是，日文的“Kutu”發音與「苦痛」（くつう〔Kutsū〕）的發音諧音，可以日文漢字「苦痛」作為“Kutu”的漢字假名。換言之，書封上藍色字樣的“Kutu”既是「古都」的回憶，也是充滿藍色憂鬱的「苦痛」回憶（如圖 1）。

章節倒置的安排，使原著帶有開放性的讀法失去效應，也使朱天心《古都》中的「我」愈回憶愈深陷於過往的記憶。雖然譯者將《古都》每一章節的內容詞句皆完整譯出，是「忠誠」於原文內容的翻譯行動，但在譯者章節

倒置的操縱下，《古都》日譯本對於你／我記憶交織的身分追尋與集體記憶的時空詮釋，也就被定為「苦痛／古都」（Kutsū/Kutu）的時空逆旅，這種情感敘事差異（從展望未來轉向苦痛回溯）是結構重構影響閱讀體驗的有力支撐。同時，書封上的諧音設計，更是譯者對主題進行「結構性顯化」的具體成果。原作的情感敘事原是以疊加的方式累積，但是譯作卻使敘事脈絡倒轉，將文本的閱讀體驗進行了時空逆轉的推導。

圖 1

《古都》日文版書封



註：書封右側有藍色的“Kutu”字樣，象徵藍色憂鬱的苦痛回憶。取自朱天心（1997／2000）。

肆、譯者主體性與結構性顯化的操縱

清水賢一郎對章節順序的重構是刻意所為。這份譯者的公開聲明，構成本研究推論其「刻意操縱」與「設計閱讀路徑」最直接、最有力的經驗性佐證：

作品的編排秩序是依照譯者的判斷，採用與原著顛倒的歷史溯源方式，將〈古都〉調整為首，其次是〈匈牙利之水〉、〈第凡內早餐〉、〈拉曼查志工〉、〈威尼斯之死〉。（清水賢一郎，2000／2002，頁178）

這揭示了譯者有意透過「契合日本讀者的閱讀習慣」的結構調整，來強化文本的主題。這種章節性的重構能觸動日本讀者對歷史反思與物哀（mono-no-aware）的接受習慣，將涉及歷史、家族記憶的章節置前，亦能觸發日本讀者對殖民史、記憶與失落等主題的文化共鳴，更容易進入文本的情感世界。

為了進一步描述這種翻譯操縱的現象，以下將以「結構性顯化」（structural explicitation）的概念進一步說明。結構性顯化的概念來自翻譯學中的「外顯假說」（Explicitation Hypothesis）。翻譯的外顯性是由布倫庫卡（Shoshana Blum-Kulka）所提出，主要探討的是翻譯如何影響文本的清晰度和連貫性（Blum-Kulka, 1986）。這一假說指稱，譯文往往比原文的邏輯更清晰，內容會包含更多外顯的資訊和細節，而且無論翻譯涉及何種特定語言，翻譯的外顯現象都會發生，因此翻譯的外顯性被視為翻譯語言的一種普遍特徵（Blum-Kulka, 1986）。「結構性顯化」將這一概念擴展到文本的宏觀結構層面，作為一種翻譯策略，譯者藉由章節順序的調整，把原作中隱含的因果關係或主題線索在結構上進行顯化（Klaudy & Károly, 2005）。《古都》日譯本便是藉由倒敘結構的操縱，將「過去如何塑造現在」的邏輯從隱含轉為外顯。

清水賢一郎作為學者兼譯者，他對翻譯章節的重構行動，可視為是一種帶有學術介入的再詮釋。他將自己對《古都》的理解，也就是把歷史溯源的邏輯內嵌於譯本結構之中，使讀者尚未開始閱讀就被譯者的詮釋框架框住，閱讀過程就會依照譯者對閱讀的設定路徑前進：從朱天心的身分焦慮走向更具普遍性的歷史反思。

從目的理論的視角看，翻譯決策往往由譯文預期發揮的功能目的所驅動（Vermeer, 1989）。作為國書刊行會「新臺灣文學系列」的叢書之一，《古都》日譯本承載了該系列旨在向日本大眾引介臺灣現當代文學的出版取向。這種明確的出版定位，亦可能影響譯者對讀者接受度與市場可讀性的考量。由此觀之，日譯本將〈古都〉置於全書開篇，或可視為配合該出版定位的編排策略，旨在藉由情感感染力較深的篇章先行建立讀者共鳴，從而提高其續讀意願。

與目的理論相呼應的是勒菲弗爾 (Lefevere, 1992) 的重寫理論。在日本的文學市場上，譯文的成功往往取決於其是否符合當地的閱讀審美與敘事期望，日本讀者普遍偏好敘事結構清晰、情感焦點突出的小說形式，這使得將情感高潮提前、以封閉式結束收尾的結構調整，可成為一種適應市場需求的編譯策略。換言之，清水賢一郎的章節重構，不僅是個人譯者的審美判斷，也是日本出版定位與市場運作邏輯的反映。這種在翻譯過程中重新進行文化與意義再生產的行為，可視為一種文化轉譯，反映翻譯是受到目標文化、歷史脈絡與意識形態影響的文化實踐 (Bassnett & Lefevere, 1990)。

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所提出的異化與歸化理論，則為這一現象提供另一種解釋框架。將情感高峰提前、調整敘事節奏，可視為宏觀結構層面上具有歸化傾向的策略。此類策略有助於降低讀者面對文化與敘事節奏上的陌生感 (Venuti, 1995)，使譯文更貼近日本讀者的閱讀習慣。原作的碎片化與非線性結構，可能對不熟悉朱天心寫作風格的讀者構成挑戰，而重構後的版本，在保留多時空場景的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一條較為穩定的情感主線，減少因結構陌生化而產生的閱讀距離。

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也為章節重構提供了另一層理解。這種「等效反應」有時需要犧牲原作形式上的忠實，以換取在情感或認知效果上的等值 (Nida, 1964, 2001; Nida & Taber, 1969)。對熟悉臺灣文化語境的原作讀者而言，將情感高潮放在結尾是一種累積式的情感策略；然而，對日本讀者來說，如果對中間章節的文化背景缺乏共鳴，可能在情感累積尚未完全建立前就對繼續閱讀失去興趣。因此，將〈古都〉提前，可能是適應日本閱讀文化的一種可行策略，優點在於能更快觸發讀者的情感反應，實現跨文化閱讀的功能等效。

貝爾曼 (Antoine Berman) 提出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傾向，揭示了翻譯過程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即譯者傾向於調整原作的句子結構與排列方式，使其更具邏輯性與線性，並更符合目的語的表達規範與閱讀習慣 (Berman, 1985/2000, pp. 280-281)。這種合理化並不必然是消極的，它往往能降低理解難度，提升閱讀愉悅感。然而，合理化也可能導致原作的獨特性被稀釋。

若日譯本將情感核心提前確立，使後續情節圍繞此一核心展開，則清水賢一郎的章節重構可被理解為一種提高連貫性與讀者可接受度的合理化處理。

將這些理論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古都》日譯本的章節重構是一種多重動因下的策略選擇：既有文化市場導向的考量，也有讀者接受心理的考慮；既有功能目的的導向，也涉及詩學規範與合理化傾向的共同作用。這證明譯者的決策是「多重動因下的策略選擇」，而非單一理論所驅動。這種多重策略的交織，使日譯本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了微妙的意義偏離。

相較於宏觀性章節結構的重置，清水賢一郎在內文的翻譯上卻展現高度的忠實與細膩，譯本在翻譯臺灣地名、歷史典故等文化細節上，不僅保持了中文漢字，對於重要的內容也在文本內予以詳註，並以「注音假名」的方式註記專有名詞，內文的翻譯呈現了翻譯書獨有的異國風情，各章節皆能看到清水賢一郎以細膩精準的翻譯技巧如「漢字＋注音假名」，在字句行間為專有名詞進行注釋。綜觀清水賢一郎章節重構及文字細譯的翻譯實踐，可以理解他在宏觀結構層面上採用了「歸化」的策略，而在文化細節等微觀層面上則採取了「異化」的策略。

「注音假名」與「夾注」這兩種翻譯技法在《古都》日譯本中頗為常見。日本近代以降便與國外有密切的跨文化交流，翻譯書中的「注音假名」表記系統（龜井秀雄，2014，頁 113）也隨之應運而生。除了「注音假名」之外，譯者還會使用一種名為「夾注」（割注）的註釋法，進行譯語的直接解釋。這種方法最早出現在橫山由清翻譯的《魯敏孫漂行紀略》（笛福，1719／1857）日文版中（龜井秀雄，2014，頁 113）。橫山由清在翻譯《魯敏孫漂行紀略》時遇到很多外語詞彙，他對外國的地名和人名統一採用「漢字＋注音假名」的方式翻譯，這種對外國專有名詞的翻譯方法，嚴格來說還可追溯至日本江戶晚期到明治初期之間，隨後才逐漸奠定下來且沿用至今。

十九世紀中葉後，日本譯者便習慣使用自選漢字作為形符（或意符），再以注音假名進行旁注的技法。這種技法能盡可能地採用「漢字」來「解釋」外國名詞或為其「賦予意義」。因此，只有翻案小說才看不出譯者的行蹤，

翻譯小說則因譯註與創詞的翻譯方法的大量使用，使得日文譯本很容易見到譯者在翻譯操作上的能動性與現身性。這種翻譯方法的運用會使譯者的存在性得到突顯，並保留外國文學特有的「陌生感」與「異國情調」。換言之，日本近代的翻譯特徵就是朝向「異化翻譯」的方向發展，而譯者在「夾注」中對詞彙的補充說明與看法，也自然而然地植入到作品中，使譯本變成譯者表達意見、干涉源語文本「原貌」的產物。「注音假名」與「夾注」的使用，不斷突顯譯者的存在，譯者對於詞彙的夾注使用愈多，就愈能展現譯者個人對作品的主觀見解。

此外，中村正直翻譯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西國立志編》時（斯邁爾斯，1859／1871），在夾注中直接提到「譯者」（龜井秀雄，2014，頁116），⁵並直接把譯者從翻譯簾幕的後方拉到了臺前，使得過去「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譯者，現在卻走進鎂光燈中。龜井秀雄認為中村正直將譯者放到正文中，是日本譯者為自己言說的開始（龜井秀雄，2014，頁116）承上，譯者常用「夾注」和「創詞」等翻譯技巧來突顯作品中的「異」質性，這使譯者更為「前景化」（龜井秀雄，2014，頁119），並暴露出他們對於自身的文化身分有著高度的自覺及自信。

藉由以上對日本獨有的翻譯技法的梳理，我們可以歸納出幾種日本譯者的特徵，其一是具有譯者主體性，日本譯者對於自身的文化身分有高度自覺；其次，譯本顯示顯著的菁英主義特徵，譯者不避諱在翻譯時顯露自己的存在，對於外國專有名詞的處理，常使用「漢字＋注音假名」的方式創造新詞，有

⁵ 原文內容如下：「^{ベイコン}倍根マタロジック明論ノ法又推論明理ノ学ト訳スノ学ニ長セリ、嘗テ言語猶曰文字ト心思ト互ニ相關係スル甚大ナルコトヲ論ジテ曰く、人々、オモヘラク理趣ハ言語ノ主トナリテコレヲ管理ストイヘリ、我ハ思ヘラク言語時トシテ理趣ヲ奪フコト往々ニコレアリ、^{ロック}洛克コレヲ祖述シテ言語ノ妄用及ヒ完全ナラサルコトヨリシテ理趣ヲ害スルコトヲ論スル文アリ学士家ニ重ゼラル訳者曰、東西言語ノ氣象異ナレバ語言ノ事ヲ論スルコトハ訳シ難ケレハ略ス」（龜井秀雄，2014，頁116）。（翻譯：倍根精於邏輯明論之法，亦即推論明理之學。曾論及語言與文字、心思之間有極大的相互關係，並曰：「人們多以為理趣為語言之主宰而加以管理。」我則認為，語言時而反奪理趣，往往有之。洛克承繼此說，著文論述由於語言的妄用與不完善，常使理趣受損，學者之家甚為重視。譯者曰：由於東西方語言氣質不同，論及語言之事翻譯頗難，故略去不譯。）（本註腳之粗體與中文翻譯為筆者所標註、所譯）

時以歐語直譯的方式處理外國名詞，有時以創詞的方式處理外國名詞，讓譯本顯露出重層現象，既給讀者闡釋外國語言的「形義」（取形賦義），也給讀者提示原文的「音譯」（提示語音），使「注音假名」與「夾注」所到之處皆是異國情調。

伍、章節重構在國際翻譯實踐中的定位

將《古都》日譯本的章節重構策略，置於更廣泛的國際翻譯實踐中進行比較，可以更清晰地界定其獨特性與意義。在國際翻譯實踐中，譯者改動原作章節順序並非罕見現象。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英譯本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Murakami, 1994-1995/1998) 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英譯者魯賓 (James Rubin) 在出版社的建議下，刪除了原作中約六萬字的內容 (Murakami, 1994-1995/1998)，並對部分章節的順序進行了調整，以增強故事的線性推進和情節的緊湊感。與《發條鳥年代記》的英譯本相比，兩者都進行了結構調整以提升目標讀者的閱讀緊湊感與情感投入度。然而，《發條鳥年代記》的英譯過程伴隨了大量字數的刪減，這不僅影響了文本的節奏，更改變了敘事的完整性。相較之下，《古都》日譯本則是在「完整保留內容」的前提下，只以章節順序的逆轉進行重構，彰顯其策略的「溫和性」，避免了因內容刪減而引發的忠實爭議。

另一個例子是《道德經》的多種英譯版本。由於歷史傳承與出土版本的差異，不同譯者在章節順序上有顯著不同。翟林奈 (Lionel Giles) 的版本將章節依主題重組，符合西方哲學論述的邏輯；而韓祿伯 (Robert G. Henricks) 則依據馬王堆帛書版本進行編排，與通行本的章節順序迥異，這種改動並非出於情節推進的考量，而是為了構建一種新的哲學理路 (Kirkland, 1997, 2004)。與《古都》相比，《道德經》的章節重構動機主要是思想邏輯的再構，而非情感節奏的調整；而《古都》的章節改動則主要在於情感節奏的重組，以適應日本文學的閱讀偏好與文化審美。

此外，與韋利（Arthur Waley）的《西遊記》英譯本 *Monkey*（Wu, 1942/1961）相比，《古都》日譯本的重構策略更顯出其獨特性。韋利的譯本結合了選譯與重構，將敘事焦點集中於主要人物的冒險經歷；而《古都》日譯本則主要透過章節次序的調整，提升譯本在目標文化中的可接受性。

承上，發生於跨文化翻譯上的章節重構，可能的動機可歸納為三：一是文化適應，二是邏輯重組，三是市場策略。這些動機往往交織在一起，並根據具體文本的類型、目標讀者群體的偏好以及出版定位而呈現不同的實施方式。《古都》日譯本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一種完整翻譯下的結構重寫，達成了文化適應與情感節奏調整的雙重目的。本研究將此策略定位為一種溫和且高效的「跨國出版策略」，允許出版商在目標市場快速建立情感連結，同時避免像《發條鳥年代記》英譯本那樣因「大幅刪減」而引發對忠實的爭議。《古都》日譯本平衡了形式忠實與文化適應兩個翻譯學上的重要議題，挑戰了傳統譯學中「忠實」與「創造」的二元對立，譯者可以在不犧牲文本完整性的前提下，以章節重構的創造性處理方法來達成文化適應的目的。這種策略能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同時，讓譯文更貼近目標文化的情感節奏與敘事邏輯，為文學翻譯的跨文化溝通開創一種可能性。

陸、結論

本研究透過對朱天心《古都》及其日譯本的分析，探討了清水賢一郎在翻譯過程中對原作章節順序進行重構的現象，揭示了翻譯學中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在跨文化文學傳播中，譯者如何在「忠實原作」與「文化適應」之間作出抉擇。清水賢一郎的案例顯示，這種抉擇不僅取決於譯者個人的翻譯理念，還受制於出版策略、目標讀者群體的閱讀偏好，以及文化市場的運作邏輯。研究發現，這一重構行為是有意為之、具備理論基礎的翻譯策略。

理解此一現象的關鍵，在於運用「結構性顯化」的譯學概念。譯者藉由調整章節順序的手法，將原作的敘事邏輯清晰地呈現出來。「逆寫」性的結

構重置，使朱天心個人的記憶書寫，被重新定位為一種更具公共性與普遍性的東亞共同記憶。

清水賢一郎的譯例將譯者定位為主動、有意識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⁶與詮釋者。深化譯者作為「文化中介者」的應用角色，在於強調其透過結構調整，影響日本讀者對臺灣當代文學的感知與價值判斷，這對於翻譯教學與出版實務具備高度啟發性。譯者在此不僅是語言的轉換者，更是文本的重構者與閱讀路徑的設計者，譯者主體性的實踐不只限於詞句的選擇技法，還可透過結構的創造性處理予以實現。《古都》日譯本能在不犧牲文本完整性的前提下，僅以結構調整來實現跨文化適應，已為譯學實踐與研究提供出一種新範例。

《古都》日譯本的章節重構不僅是一個翻譯技巧，更是譯者展示主動性的演繹舞臺；譯者不僅是跨語言的橋樑，更是重塑原作結構、意義與文化脈絡的中介者。當《古都》以「倒敘」方式被閱讀時，它已不只是朱天心個人的記憶書寫，而是一場由譯者精心策劃，與作者進行跨越語言與文化思維交流的記憶對話。

⁶ 文化中介者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論述的重要概念，指在創作者與消費者之間扮演調解角色的個人或群體，在參與文化品味與消費模式建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Bourdieu, 1993, 1996）。隨著此概念的延伸與運用，此詞語已產生多重詮釋，研究者開始進一步關注其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中介、介入與權力關係（李令儀，2014）。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朱天心（1999）。《古都》（珍藏紀念版）。麥田。

【Chu, T. H. (1999). *Gudu* (Collector's ed.). Rye Field.】

李令儀（2014）。〈文化中介者的中介與介入：出版產業創意生產的內在矛盾〉。
《台灣社會學》，28，97—147。https://doi.org/10.6676/TS.2014.28.97

【Lee, L. Y. (2014). The medi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creativity production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aiwanese Sociology, 28, 97-147. https://doi.org/10.6676/TS.2014.28.97】

哈布瓦赫（Halbwachs, M.）（2024）。《記憶的社會框架》（陳秀萍譯）。麥田。
（原著出版年：1925）

【Halbwachs, M. (2024).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X. P. Chen, Trans.).
Rye Fie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唐小兵（2000）。〈《古都》·廢墟·桃花源外〉。載於周英雄、劉紀蕙（主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391—402）。麥田。

【Tang, X. B. (2000). *Gudu, feixu, taohuayuan wai*. In Y. X. Zhou & J. H. Liu (Eds.),
Shuxie Taiwan: Wenxue shi, houzhimin yu hou xianda (pp. 391-402). Rye
Field.】

清水賢一郎（2002）。〈「記憶」之書—導讀朱天心《古都》日文版〉（張季琳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1），173—179。（原著出版年：2000）

【Shimizu, K. (2002). “Jiyi” zhi shu: Daodu Zhu Tianxin *Gudu* Riwen ban (J. L. Zhang, Tran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2(1), 173-17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陳國偉（1998）。〈遺失地址的理想國——朱天心小說中的記憶烏托邦〉。《淡水牛津文藝》，1，45—71。

- 【Chen, G. W. (1998). Yishi dizhi de lixiangguo: Zhu Tianxin xiaoshuo zhong de jiyi wutuobang. *Tamsui Oxford Literature*, 1, 45-71.】
- 楊如英（1998 年 10 月）。〈多重互文、多重空間：論〈古都〉中的文化認同與文本定位〉。台灣文化研究網站。https://iccs.chss.nycu.edu.tw/joyceliu/TaiwanLit/online_papers/multispace.html
- 【Yang, R. Y. (1998, October). *Duochong huwen, duochong kongjian: Lun Gudu zhong de wenhua rentong yu wenben dingwei*. TaiwanLit. https://iccs.chss.nycu.edu.tw/joyceliu/TaiwanLit/online_papers/multispace.html】
- 劉雪真（2009）。〈形式之寓意：論朱天心〈古都〉的敘事策略〉。《東海中文學報》，21，201—229。<https://doi.org/10.29726/TJCL.200907.0009>
- 【Liu, X. Z. (2009). The meaning of form: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Chu Tianhsin's "Ancient Capital".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21, 201-229. <https://doi.org/10.29726/TJCL.200907.0009>】

英文文獻

- Bassnett, S., & Lefevere, A. (Eds.).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 Publishers.
- Berman, A. (2000).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L. Venuti, Tran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276-289).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 Blum-Kulka, S. (1986).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In J. House & S. Blum-Kulka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17-35). Gunter Narr.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Polity.
- Bourdieu, P.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rkland, R. (1997). *The Taoism of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and the Taoism of China: De-colonizing the exotic teachings of the East*.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 Kirkland, R. (2004). *Taoism: The enduring tradition*. Taylor & Francis.
- Klaudy, K., & Károly, K. (2005). Implication in transl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erational asymmetry in transl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6(1), 13-28. <https://doi.org/10.1556/Acr.6.2005.1.2>
- Kristeva, J.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L. S. Roudiez, Ed.; T. Gora, A. Jardine, & L. S. Roudiez,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 Murakami, H. (1998).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A novel* (J. Rubin, Trans.).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1995)
- 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 J.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04495746>
- Nida, E. A. (2001).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Nida, E. A., & Taber, C. 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 J. Brill.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Vermeer, H. J. (1989).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In A.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pp. 173-182). Oy Finn Lectura Ab.
- Wu, C. C. (1961). *Monkey* (A. Waley, Trans.).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2)

日文文獻

亀井秀雄（2014）。《日本人の「翻訳」：言語資本の形成をめぐる》。岩波。

【Kamei, H. (2014). *Nihonjin no “honyaku”: Gengo shihon no keisei o megutte*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linguistic capital]. Iwanami.】

朱天心（2000）。《古都》（清水賢一郎譯）。國書刊行會。（原著出版年：1997）

【Chu, T. H. (2000). *Koto* [Old Capital] (K. Shimizu, Trans.). Kokusho Kankoka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斯邁爾斯（Smiles, S.）（1871）。《西國立志編》（中村正直譯）。日本国文学研究資料館。<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300024831/1?ln=ja>。（原著出版年：1859）

【Smiles, S. (1871). *Saigoku risshihihen* [Self-help] (M. Nakamura, Tran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300024831/1?ln=j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9)】

笛福（Defoe, D.）（1857）。《魯敏孫漂行紀略》（橫山由清譯）。出雲寺万次郎。（原著出版年：1719）

【Defoe, D. (1857). *Robinson hyoko kiryaku* [Abridged account of Robinson’s drifting voyage] (Y. Yokoyama, Trans.). Izumoji Manjirō.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19)】

